

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 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

朱士光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为探究西安地区各朝代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结合大量史料,对西周、秦、西汉、隋与唐王朝都城之规制、建设、平面布局、主要建筑之思想理念进行剖析。分析认为:西周都城文化充分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秦都城文化体现了大一统的精神;汉长安城文化以尊儒思想为主体,整合了前朝相关理论,并有所创新;隋唐长安城文化表征了多元文化的开放气象。

关键词:西安;古都文化;政治理念;治国方略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4-0001-08

西安市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16个王朝与政权建都之地(在西安市及其附近地区先后建都的16个王朝与政权是:西周、秦、西汉、新、汉更始帝刘玄、赤眉帝刘盆子、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大齐皇帝黄巢等)^[1],特别是其中的西周、秦、西汉、隋与唐等几个统一强盛的王朝建都于此,由于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进程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因而其都城文化也内涵丰富,特点突出,影响范围广阔且深远。都城文化不仅是西安乃至关中地区地域文化的核心成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就西周、秦、西汉、隋与唐等王朝都城之规制、建设、平面布局、重要建筑之思想理念,剖析其主要的文化内涵与基本特点。

一、西周都城文化之主要内涵

周人始祖名弃,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今陕西杨凌区),号后稷。后至其孙公刘,带领族

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县西)。下传至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时,又带领周族迁至岐下,即今关中西部岐山之南的周原一带,并营筑城郭室屋,作五官有司,建立了西周早期之奴隶制国家。近几十年来,通过长期考古发掘,在周原地区除发现一个北以岐山山脉为界,东至扶风县黄堆村,西到岐山县祝家庄镇,南达扶风县法门镇,面积约为15 km²的西周遗址区外,还在这个遗址区内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发掘出一座早期周人的宫殿基址,并在其东约2 km之扶风县法门镇召陈村发掘出一座西周中期偏晚的大型宫室建筑基址。这证实了此即为早周都城岐邑的宫室分布区^[1-4]。

周王室传至西伯昌(即后追谥的文王)时,因遵后稷、公刘之业,继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士以此多归之,国势大振;在与周围诸侯、诸戎之战争中屡屡取胜,因而与殷王之矛盾日益加剧。而当时殷纣王荒淫暴虐,天下归心于周。于是文王决定东向发展,第一步就是伐灭位于今西安市渭水以南户县至蓝田一带的殷人附属国崇侯,继

收稿日期:2011-11-05

作者简介:朱士光(1939-),男,湖北武汉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朱士光: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

而在沔水以西建立丰邑,并自岐邑徙都于丰。徙都丰邑后之次年文王崩殂,武王继位,很快又在沔水东岸营建镐京^①。丰镐二京隔沔水相望,实为一城。周武王正是以都城丰镐作为政治中心,励精图治,历12年经营,终于在公元前1046年灭掉殷商王朝^②,使周王朝成为中华大地上替代商王朝而继起的华夏一统之强盛王朝。

西周都城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是充分反映了周代之礼乐文化。

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也就是前期封建制社会,强调王权天授。周人认为,天地间最高统治者“天帝”,周王又称“天子”,即“天帝之子”,所谓“君天下曰天子”,秉承天意而君临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在国内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通过建立宗族政权,即血缘亲属网络,别嫡庶亲疏与尊卑贵贱,形成礼制,巩固政权。上述西周统治集团之思想观念在都城各类设施之布设建筑上都有充分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统治集团举行大典与祭祀活动的宫殿、宗庙都设置在都城中心部位及地势高耸之处,且建筑严整雄伟,以显示周王之权势与威严。

前已述及的岐邑之凤雏甲组宫室(宗庙)基址,丰京遗址北部之大型宫殿与宗庙基址、镐京遗址北部坐落在高台基上的5号宫殿基址等,都是具体例证,且一脉相承之文化传承关系。这一都城中宫殿、宗庙之布设理念,对后世之都城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岐邑与丰镐二京中宗庙与宫殿建筑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凸显了西周都城中祭祀活动的盛行与祭祀文化的浓厚。

西周时本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治国理念,而且国都也必须有宗庙^④,西周都城正是这方面的范例。如岐邑,因是周族与西周王朝发迹之地,又是文王、武王、周公等西周初期重要王侯埋葬地,因而被论定为西周的“圣都”,之后的宗周,即丰镐二京则被视作“俗都”^⑤。俗都作为王朝之实际统治中心,虽也举行日常之祭祀仪式,但圣都是宗教祭祀意义上的都城,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⑥。因而尽管文王末年已迁都于丰,武王又都于镐,但终西周之世,岐邑之祭祀设施仍在不断增加,祭祀活动也一直持续。再如丰京,虽然武王继位后,另建镐京,并长居之,以后西周诸王也加承袭;但因丰京周王室宗庙地位崇高,武王及之后的历代周王,每遇大事都要去丰京宗庙祭

告,丰京仍是祭祀活动之中心。当然,镐京之祭祀活动也是常年不断的。上述情况从岐邑、丰京、镐京遗址区发现的宗庙遗址及大批甲骨文、青铜礼器、玉器中均可得到证明。

第三,西周都城中发掘出多处家族墓葬,如丰京遗址区、今张家坡村之西周贵族井叔家族墓葬等,反映了西周宗族政权的统治理念。

因为西周宗族社会政权形态是按照“天子立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⑦分级立宗的分封制建立起政治上的统治体系,因而各级宗族都掌握大小不等的权力,生时要聚族而居,死后也要聚族而葬。

第四,西周都城基本上是按《周礼·考工记》之規制原则布局建设。《周礼》一书,尽管在西汉后期问世后曾遭今文学派诬为伪书,但经西汉以后历代学者,特别是近现代众多学者研究,上说已被否定,且被明确论为系战国时期学者所著,保存有大量西周史料,许多内容参照了西周时的实况,并非战国时人的向壁虚造。其中《考工记》一篇,虽为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补之,但也被近世学术界考证为战国时人所作^⑧;其性质与价值当与《周礼》其他名篇相类似。《考工记》所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也当本西周礼制思想,参照西周都城之实际状况总结而出。前已述及,西周都城岐邑与丰镐,虽经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长期钻探发掘,但终究因年代久远,破坏埋废严重,尽管已发掘探明了大量的建筑基址与手工业作坊遗址、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玉器、陶器与砖瓦残片,但是整个岐邑与丰镐二京之整体布局状况并未全面揭示出来,因而尚不能完全证明与《周礼·考工记》所记国都規制相吻合。但是从已发掘探明之岐邑凤雏甲组宫室(宗庙)基址与镐京5号建筑基址,也反映出《周礼·考工记》都城規制思想之一斑。同时,从周成王即王位与其叔周公旦摄政时所建之洛邑(又称“成周”)之规模与布局也可加以映证。《逸周书·作雒解》曾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十七里”,“建大社于国中”,“乃立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寝、

① 《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18、128页。《诗·大雅·文王有声》及毛传释文、郑玄笺注。

② 此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之研究结论,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纪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49页。

③ 《礼记·曲礼下》;《诗·小雅·北山》。

④ 《左传》成公十三年及庄公二十二年条所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⑤ 《左传》桓公三年。

明堂”,“设丘兆于南郊”。这表明成周有城有郭,城内有太庙、宫寝,南郊有祭天之丘坛。作为西周时期之陪都,规模宏伟,主要设施齐全。按西周之宗法礼制,成周之规制不能逾越作为主都的宗周(丰镐),从中也可概见宗周之规制,其基本状况应是《周礼·考工记》相通的。

二、秦都城文化之主要内涵

秦之都城,以雍、栌阳以及尚未建成的大一统帝都咸阳为代表,都是在秦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主导下兴建并扩展的。其中尤以咸阳反映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也最大。这里即以它为例,举出主要的几端加以论析。

第一,商鞅“大筑冀阙”所彰显的法家治国思想。商鞅大筑之冀阙,就是修建于咸阳宫之宫廷外的高大阙门,即于宫廷大门外两侧各建楼观,中间阙然为道,可以通行。商鞅所建之冀阙,据《史记·秦本纪》中《正义》引刘伯庄的解释是“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所谓“象魏”,则来自《周礼·天官·大宰》。该条记道“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狹日而敛之。”是说古代君王与大臣,在正月朔日,在国都宣示治国之法令,并悬之于象魏,使万民观后知晓,十日后始收藏。文中之“象魏”,古人即指“门阙”,“象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貌也”^①。《周礼》中有此记载,商鞅将之实际践行。以致他曾将在秦国推行变法与在咸阳“大筑冀阙”联系起来,自得地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迁都咸阳后,商鞅继续大行变法之令,使“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②。商鞅被杀之后,其法继续得以施行,并促成秦国完成帝王之业。因此商鞅以刑名之学施行变法之策以求帝王之业的治国理念,在秦国统一全国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反映在秦之新都咸阳之建筑过程中,冀阙显然是其标志性建筑。

第二,宫殿宗庙建置中法天象地的规划思想。这在秦始皇于吞灭关东六国后之次年在渭河南岸兴建信宫起即已显其端倪。史载信宫建成后,他即改其名为“极庙”、“象天极”。“极庙”即为他生前的宫庙,称之为“象天极”,即是以天上之天极星,也就是北极星自况,以天空中为群星拱卫的北极星来显示他作为人间皇帝之至尊地位。之后,他在兴建阿

房宫时,又擘画“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③。东汉末人所撰《三辅黄图》在述及此事即写道“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文中所说秦始皇“筑咸阳宫”,实指他对咸阳宫进行的大规模改建与扩建,包括秦昭襄王时在渭河上所建的横桥。其中咸阳宫与天上的“紫宫”对应。“紫宫”即紫宫垣星,又称紫微星,北极星居其中,众星四布以拱之,也称天极星,是主宰宇宙的“大帝”、“泰一”之座,天帝所常居;地面上,渭水北岸的咸阳宫则为人间主宰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所居,是地面之“紫宫”。而渭河南岸的阿房宫与天上之营室星相对应。营室星在古代也被认为是天子之宫,是天子的离宫别馆。而处于咸阳宫与阿房宫之间的渭河,则与天上之银河对应。银河又称“天河”、“天汉”。而渭河上之横桥,即与阁道星对应。“阁道”,古人认为是“天子欲游别宫之道”^④。每年农历十月黄昏时分,在咸阳原上仰望,天空营室星正当南中天,紫微星居北,北极星位于其中心,银河居中东西横贯其间。此时天空中这一星象分布格局,正好与渭水两岸之咸阳宫殿群遥相对应^{[1][8]}。显然,对都城咸阳这一由秦统治集团精心所作的规划与建构,就是要通过“法天象地”这一意象,向臣民传达出秦王与统一天下后之秦始皇帝,是代表天帝君临天下的思想,借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妄求自始皇帝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⑤。

第三,大一统的精神所形成的秦都咸阳盛大而开放的气象。西汉之贾谊,在他的著名策论《过秦论》之上篇,起首即写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言明自孝公起,秦之君臣就有统一天下之雄心。后又写道“及至秦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寓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殳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

① 《梁书》卷五一《何点(附弟何胤)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737页。

②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2、2234页。

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页。

④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紫宫……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所附之《正义》注释,中华书局,1959年,第1289、1290、1291、1309页;《汉书》卷二六《天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274、1279页;《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0页。

⑤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36页。

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正是因为自秦孝公十三年徙都咸阳之后,随着商鞅变法持续而顺利地推行,以及攻灭关东六国战争的节节胜利,使秦君臣统一天下之思想日益强烈,从而对国都咸阳之规划建设,除了前述遵从法天象地观念进行实施之外,还有就是以宏大气魄进行开放式布设,这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

第一,咸阳有宫城无郭城。尽管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中国先民即有筑城自卫的传统,且史籍中也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①记述。再揆之春秋、战国时期之史实,各国筑城之风甚盛,秦国在徙都咸阳前所建都城也都曾筑城;但在秦都咸阳,经考古工作者近数十年来之反复调查勘探,除发现渭河以北咸阳宫城外,一直找不到郭城踪迹。一些研究秦都咸阳的学者因此论定咸阳“有宫城无郭城”,从秦迁都咸阳后集中力量从事统一战争并节节取得胜利之史实与秦国君臣自恃关中河山险固,对国都安全充满自信的认识根源做出了解释。

第二,与之相关,就是除在咸阳及其以南区域扩建新建宫殿外,还在整个关中地区大肆兴建宫观。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还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史籍上甚至还留下“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泾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锦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②等记载。以上史籍中所言虽难免夸饰成分,但经近世学人考察研究,关中地区除渭北咸阳宫室区与六国宫室区、渭南兴乐宫室区与阿房宫室区外,其他地方的秦代宫殿确也不少。其中已知确址的就有步高宫(在今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张胡村)、长杨宫(在今周至县终南镇东南竹园头村)、林光宫(在今淳化县凉武帝村一带)、梁山宫(在今乾县县城西关外1 km处)、回中宫(在今陇县东南5 km之泾河右岸磨儿塬上)等十多处^③。

综上所述,在完成统一天下的帝业进程中,秦君臣对于都城之理念的确不同于之前的古人与同时代关东六国君主,而是具有宏阔的胸襟与开放的心态。以至于到宋代时,宋敏求在其所著的《长安志》中竟引文论到“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泾以为秦西门”,真是达到何等的恢宏气度。然而滥用民力,穷极奢侈,加之暴虐无道,终于激起民怨沸腾,天下反叛,看似固若金汤的崤函雄关险隘以及关中之千里

金城,瞬息易势,土崩瓦解,原企盼的万世帝业,仅二世即亡。庞大而雄伟的秦帝都咸阳,特别是其渭水北岸咸阳宫、六国宫区部分,也在秦末战火中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是贾谊在《过秦论》中一语中的“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此中之历史教训已不限于都城营建规划与规模了。

三、汉长安城文化的主要内涵

汉长安城作为继秦王朝大一统封建帝国覆亡后兴起的西汉王朝的国都,在其200余年的历史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统治集团治国施政理念之变化,也都反映到都城之建设中。另外,西汉帝国之都城文化,有的则是继承前代之传统文化。现择其要加以剖陈。

第一,萧何之“重威”思想。萧何是辅佐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建立西汉帝国的主要功臣,被刘邦誉为汉初三杰之一,屡受刘邦褒奖。高祖五年,萧何受命营建长乐宫与未央宫。高祖八年,未央宫成,立有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等。高祖东击韩王信余众后还京,见宫阙壮甚,对萧何大怒道“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回答道“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听后信以为是,转怒为喜^④。萧何前述回答所言,治宫室壮丽以为天子重威的思想本是前人之传统观点,他只是加以践行发扬,且也为后世师法。

第二,汉惠帝筑城之“道法自然”思想。因西汉初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战乱频繁,民作失业,饥谨建年。就连在楚汉战争结束,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后,也是民亡盖藏,经济仍然十分凋敝。这一状况虽到孝惠、高后时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好转。面对这一经济社会状况,西汉前期统治集团皆崇奉“黄老之学”,推行无为而治的施政方针。自帝后起皆躬修俭节,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以安百姓。因而在都城建设上,除先后在汉长安城中修建了太上皇庙(刘邦父亲的宗庙)、高庙(高祖刘邦的宗庙)、惠帝庙、顾成庙(文帝的宗庙,在汉长安城东南)外;于宫

① 《吴越春秋》卷五。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及《正义》引《庙记》所载,中华书局,1959年,第241、257页。

③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385、386页。

殿上一直保持萧何所建之规模,未再增建。就是到惠帝修筑长安城墙时,也如前文所述,利用农闲时间,采取分期分段筑城方略,前后历时5年,分3次征发男女民人,其中一次还是动用诸侯王、列侯之徒隶。尤其是在汉长安城之城墙形制上,不追求四面墙垣端正平直长短划一,而是随地形高低与河流走向曲折多变。对于汉长安城墙何以筑成这等形状,《史记》、《汉书》等两汉史籍均无明确记载。但东汉末成书的《三辅黄图》卷一“汉长安故城”条中称“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之后,唐代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与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中均照录不疑。认为是惠帝筑城时,主其事者有意仿天上南斗星、北斗星设计修筑的,以证实并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此类都城规划、建筑观念古代虽确曾有过,就如前述秦都咸阳是按“法天象地”观念建成那样。但揆诸汉长安城之建设过程就可看出,所谓“斗城”之说全属东汉之后魏晋唐宋时人附会之言。因而到元代,李好文在他《长安志图》之卷中《图志杂说·北斗城》中就提出了质疑。他指出“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今观城形,信然。然《汉志》及班、张二赋皆无此说。予尝以事理考之,恐非有意为也。盖长乐、未央、鄠侯(萧何)所作,皆据岗阜之势,周二十余里,宫殿数十余区。惠帝始筑都城,鄠侯已没。当时经营,必须包二宫在内。今南城及西城两方突出,正当二宫之地,不得不曲屈以遮之也。其西二门以北,渭水由西南而来,其流北据高原,千古无改。若取东城正方,不惟太宽,又当渭之中流。人有至其北城者,言其委曲迂迴之状盖是顺河之势,不尽类斗之形。以是言之,岂后人偶以近似而目之也欤?”李好文首将汉长安城形状与周围地理环境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突破前人将天上星象与地面皇居相互比附借以神化皇权的观念,确是一大突破。但此说仍犹未尽意。还需再结合惠帝时西汉国力孱弱,君臣上下遵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以体恤民力,节省财物。本着这一治国方针,在兴筑长安城墙这一浩大工役时,自会遵从较低标准,根据附近冈阜地形与河流走向,因势而建,使新建之长安城既能获得安全保障,有利于皇室与大臣们施政、居住;又能不至太繁难糜费,加重朝廷财政负担。而这一“道法自然”的黄老思想才是促使汉长安城之城墙依冈阜就势,顺河流成形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三,汉武帝尊儒思想。西汉前期崇奉黄老之学,推行“无为而治”;到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

位)继位时这一国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因当时经60余年休养生息,天下义安,国力已盛;加之武帝向往儒术,极欲有所作为。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次年又召齐地儒士公孙弘,相继任为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并封为平津侯,于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①。因而班固在《汉书》卷六《武帝纪》最后的赞语中,对武帝开边拓土的武功未涉一字,而对武帝的文治大加颂扬,赞道“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武帝大倡儒学,在都城建设上即有建明堂、兴太学之举。武帝之后的历代皇帝也遵此道,太学生员逐代增加,因而使汉长安城儒学之风日益浓郁,西汉后期之学术文化也获得前所未有之发展与繁荣。

第四,《周礼·考工记》之都城规制思想。西汉王朝承西周、秦王朝之后,其首都长安城又建在西周与秦王朝故都丰镐、咸阳之旁,因而在都城内相关建筑设施的规划布设上必然受到周、秦文化中关于建都理念的影响,特别是《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基本理念的影响。正如国内长期从事秦、汉都城与汉、唐帝陵考古发掘及研究的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李毓芳在他们合著的《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一书最后部分概括总结的,在汉长安城规划建设上,反映出的“崇方”、“择中”、“轴线”、“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特点,均与先秦时期传统都城规划思想一脉相承。尽管上述特点在汉长安城中体现得不如后代一些都城那么突出典型,但汉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与古都学家的研究已表明上述特点是确实存在的。因而汉长安城也成为体现西汉时人践行《周礼》理念规划国都所建成的一座早期都城之实例。

四、隋唐长安城文化的主要内涵

隋唐时期,主要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多种文化交融并蓬勃发展时期,其国都长安城之文化也体现

^①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8页;《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2、3593页。

了这一特点。现着重从下列几个方面加以论列。

第一,崇奉严整规则宏阔壮丽的儒学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虽有匈奴、鲜卑、羯、氏、羌族内徙,并与汉族等征战争逐,导致政权不断更迭,社会动荡;但也促成了民族与文化之融合。至隋唐时,政局趋于统一,社会日渐安定,民族与文化融合的积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到唐代,在文化上儒、释、道诸学术流派并行不悖,相互融会。然而儒学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仍处基础与主流地位。唐太宗虽好道喜佛,但仍强调“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①。因而隋唐两朝培养官员的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等学校,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也正是在儒学思想影响下,隋都大兴城的建设,其形制就与《周礼·考工记》基本相通。如城郭方正,道路通直,里坊规整,宫城与皇城占据城中北部高处,且与庶民百姓严格分离等。

至唐代,因受崇奉儒学思想使然,帝都长安之恢宏气概更达到极致。如唐太宗兴修,唐高宗建成之大明宫,本即修在高出唐长安城郭城十余米的龙首原上,殿基高达4丈多,殿面宽为11丈,超出传统中国帝王宫殿最高面阔9间的旧制。平面呈凹字形,殿前东西两侧建有向外延伸的高大阁楼,东为翔鸾阁,西名栖凤阁。前距丹凤门四百余步(约588 m),东西五百步(约735 m),面积达0.43 km²,殿庭极为宽阔,远超古代西方罗马帝国之诸多广场。殿前修建的两条平行的斜坡砖石阶道,长达75 m。每有朝会,大臣与外国使节由此两道而上,从丹凤门北望,宛如龙垂其尾,极为壮观,故又称“龙尾道”。如此之设计与建筑,为帝王权势大壮声威,达其南面而治的意念。唐代李华在他写的《含元殿赋》中称颂其有“如日之升”的气势,写尽了大唐气概。

第二,崇奉通易灵变遵道循势的道家文化。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道家学派也如同儒家学派一样源远流长。而道家学说中《周易》一书曾被古文经学家奉为群经之首,对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学术文化多方面均有直接影响,在都城建设上也反映十分突出。至隋建大兴城时,宇文恺即运用《周易》乾卦卦象,针对选定建大兴城之龙首原以南广大区域高低起伏之地形特点,从中选出六条大体东西向横亘的高坡,象征乾卦之“六爻”,从北向南依序排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高地;又按《周易》所论,分别布设不同建筑设施,规划出不同的功能分区。唐代李吉甫在其所著之《元和郡县志》中写道:

“初,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而对六坡之间的低凹地带,宇文恺则用于开渠引水,凿池造湖,既有助于解决城内生活用水所需,也增加了水面,改善了环境,增添了园林景点。总体上看,因利用岗阜低地因势规划布设各功能区与建筑物得当,既满足了皇室贵族与百官僚属居高称治的要求,也使全城各类建筑各得其宜,高低错落,变化有致。此外,宇文恺还以易学中风水思想与厌胜理论,在大兴城东南角开凿曲江池,虽将之隔于城外,但占了东南角一坊之地,使之与城外部分建成皇家禁苑,以永保隋朝王者之气不受威胁(程大昌《雍录·曲江池》)^[10]。

至唐代,由于道教以老子李聃为教祖,因而深得李氏皇室的尊崇,追认他为先祖。也正因为如此,道家思想更为流行。唐太宗建大明宫,选在东北郭城外之龙首原顶上,固然有地势高耸、可居高临下俯视全城的地形上的优势;也契合《易经》先天八卦方位即伏羲八卦方位的观念,因东北属“震”位,震为龙,是兴旺发达之象。因此大明宫建成后,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不处于全城的中位,但在《易经》之文化理念上却是对居于全城中位的太极宫的补充与崇“中”观念的强化。而玄宗时修建兴庆宫,从其择位与设计布局上,也分明受到道家思想中亲自然天道与天道无为等思想的影响。

第三,多元文化荟萃融合的开放气象。前已述及,隋唐时,特别是唐代,在政治思想与学术文化上是儒、释、道三者并行不悖,尽管其间也有曲折变化,但总体看仍是相互融会而发展。加之唐王朝自太宗起,就对域内各民族爱之如一,对域外相邻诸国也分别采取册封、羁縻、朝贡等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大力推进政治交往、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因而使都城长安呈现出一派多元文化荟萃融合的开放气象。就儒、释、道三教而言,长安城中大型礼制建筑就有皇城安上门之东的太庙、含光门之西的社稷坛以及城外南郊明德门道东1 km的祭天之坛圜丘、城北7 km祭地之坛方丘、东郊春明门外朝日之坛日坛、西郊开远门外低坎之中夕月之坛。除上述祭祀天、地、日、月坛庙外;四郊还有太乙坛、先农坛、黄帝坛、赤帝坛、青帝坛、白帝坛、黑帝坛等众多神坛星罗棋布。此外城内还有数十所公私官庙。官立庙堂中,即有

① [唐]吴兢《贞观政要》第六卷《慎所好第二十一》。

追赠皇后与皇太后、赠皇太子、赠皇帝与公主庙 22 处,品官家庙可查知的有 36 处^[1],而佛教、道教及其他外来宗教之寺观数量亦复不少。据史载,隋代有 76 座,唐代新建 83 座,共为 159 座;其中寺 83 座、尼寺 29 座、道观 34 座、女冠观 6 座、袄祠 5 座、波斯寺 2 座^[11-13]。这些寺观占地面积甚广,其中最大者往往占一坊之地,如靖善坊的大兴善寺即是。上述坛庙与寺观占据了外郭城内相当大的面积,也构成了唐长安城三教崇隆的繁盛景象与特异的文化氛围。

综前所论,可以看出隋唐都城之文化特征,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当然主要是唐朝开放的胸襟与磅礴的气势。因而唐都长安城之规划思想与建设匠意,不仅对中国后世之都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周边地区甚至域外,如日本等国也都起到了示范与引领作用。日本古都京都与奈良就是典型例证。唐朝诗人王维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一诗中写下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诗句,可以说就是对都城长安所反映出的盛唐气象的深邃而形象的概括与揭示。

五、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基本特点

关于古都文化,笔者曾指明了它的 4 大特点:(1) 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时代文化之缩影;(2) 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以至当今特定区域的代表性文化;(3) 古都文化内涵丰富,规格甚高;(4) 古都文化空间辐射力、时间穿透力强劲^[14]。以上是古都文化总体上的特点。而就西安地区之古都文化,特别是周、秦、汉与隋、唐时期之古都文化而言,还有着以下几个独具的特点。

第一,这一古都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核心与精髓,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源头与主流。这当然是因地处关中地区中心部位的西安及其附近地区自公元前 11 世纪中成为西周王朝统治中心之后,迄至公元 10 世纪初唐代末年,它作为周、秦、汉、隋、唐等统一强盛王朝首都的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化,经过之前历史时期孕育后,不仅灿然形成,而且还进入到成熟、繁盛阶段。因此,西周、秦、西汉、隋、唐之古都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凭借政治上的张力,自然成为中华文化之源头与主流。

第二,这一古都文化充分吸纳了世界文化精华,既彰显了东方文化神韵,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载体。这显然也是因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建都的西周、秦、

西汉与隋、唐王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统一王朝,而且统治集团与士庶百姓,对外族与域外文化也普遍持有开放包容心态;特别是西汉与唐王朝,更是心胸开阔,眼界高远,气魄宏大,对域外文化兼收并蓄,广泛吸纳。以自汉代由天竺(今印度)传入的佛教为例,汉长安城因是国都,不仅是首先传入汇聚之地;至唐代,长安城依仗皇室贵族的推动更成为全国佛教核心地区,是当时中国佛教的僧才凝聚、经典翻译、宗派创立、佛教弘传、文化交流的五大主要中心。长安也因此成为世界佛教文化城市和国际大都会,中华传统文化也因此更为丰富深邃,并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世界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这一古都文化,其主体部分上升至制度层面,在国家治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至西周时,奴隶制社会已开始解体;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制,至唐王朝,封建制社会发展至鼎盛程度。而这一时期,几个最重要的统一王朝均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建都,因而它们的古都文化,也即最高统治集团的治国理念,如西周的礼乐文化、秦王朝的法家思想、西汉王朝尊儒崇法与“霸王道杂之”^①的思想、唐王朝儒道释相融会的多元文化等,多渗进治国理政的制度层面;例如西周的分封制、秦之郡县制、西汉察举制度、唐之科举制度等。由上足见,上述帝都文化具有强劲的实用性与社会效应,且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六、结 语

西安市及其地区是中国历史上 16 个王朝与政权建都之地。不同朝代都城之规制、建设、平面布局、主要建筑之思想理念都有所不同。其中西周都城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是充分反映了周代之礼乐文化。秦都城彰显了法家治国思想与法天象地的规划思想,并形成了秦都咸阳盛大而开放的气象。汉长安城体现了萧何“重威”思想、“道法自然”思想、汉武帝尊儒思想和《周礼·考工记》中都城规制思想。隋唐长安城崇奉严整规则宏阔壮丽的儒学文化、循势的道家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荟萃融合的开放气象。因此,西安地区的古都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头与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彰显了东方文化神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九《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12、277 页。

朱士光: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

韵,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朱士光,吴宏岐. 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3.
- [2] 陕西商原考古队.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简报[J]. 文物, 1979(10).
- [3] 陕西商原考古队. 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报告[J]. 文物, 1981(3).
- [4] 潘明娟. 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陈全方. 周原与文化·早周都城的地理位置及其范围[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6] 张光直. 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C]//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7] 杨天宇. 郑玄三礼注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8] 张鸿杰. 秦都咸阳的规划与建设[C]//石兴邦. 周秦文化研究.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9] 王学理. 咸阳帝都纪[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9.
- [10] 王维绅. 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 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二[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27(3): 69-74.
- [11] 宋敏求, 李好文. 长安志[M]. 长安县志局.
- [12] 段成式. 酉阳杂俎续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 [13] 曹尔琴. 唐长安的寺观及有关的文化[C]//中国古都学会. 中国古都研究: 第1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 [14] 朱士光. 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3(1): 26-31.

Main implications and basic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city culture of Xi'an in Zhou, Qin, Ha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ZHU Shi-gu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Geograph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ain implications and basic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city culture of Xi'an in different dynasti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ity planning, construction, layout and the architectural ideology in West Zhou, Qin, West Ha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ith the help of a huge amount of documents.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culture in the West Zhou cities fully displays the rites and music culture of Zhou Dynasty; the ancient city culture in Qin Dynasty shows the great unification spirit and the Chang'an culture in Han Dynasty integrates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the earlier dynas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its creative sense. In contrast, the Chang'an culture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dicates its opening-up orientation in its multi-phase cultures.

Key words: Xi'an; ancient city culture; political ideology; administration ideas for a country